

SIXTEENTH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URBAN FORM



城市形态

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第16届国际城市形态论坛论文选

田银生 谷 凯 主编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50878086, 50378038)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 (8151064101000052)

广东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创新团队项目 (07JDTDXM84002)

由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广州市城市规划协会共同承办

SIXTEENTH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URBAN FORM



城市形态

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第16届国际城市形态论坛论文选

田银生 谷 凯 主编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城市形态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第16届国际城市形态论坛论文选/田银生, 谷凯主编.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0.4

ISBN 978-7-5623-3268-8

I. ①城… II. ①田… ②谷… III. ①城市规划-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TU98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4085 号

总发行: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广州五山华南理工大学 17 号楼, 邮编 510640)

营销部电话: 020-87113487 87110964 87111048 (传真)

E-mail: scutc13@scut.edu.cn http://www.scutpress.com.cn

责任编辑: 赖淑华 何小敏

印刷者: 广州市穗彩彩印厂

开本: 787mm×960mm 1/16 印张: 18 字数: 382 千

版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000 册

定价: 48.5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前 言

“国际城市形态论坛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Urban Form, 简称 ISUF)” 是成立于 1994 年的国际学术组织, 其成员包括城市规划学、建筑学、地理学、社会学、历史学等方面的专家学者, 分布于欧美 30 多个国家的大学和城市研究机构。“国际城市形态论坛”每年在世界不同的国家轮流举办, 是目前活跃于国际城市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组织, 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

自创办以来到本次会议, 国际城市形态论坛一共举办了 16 届。历次会议的时间和地点分别是:

- 第 1 届, 1994 年, 瑞士;
- 第 2 届, 1995 年, 法国;
- 第 3 届, 1996 年, 瑞士;
- 第 4 届, 1997 年, 英国;
- 第 5 届, 1998 年, 法国;
- 第 6 届, 1999 年, 意大利;
- 第 7 届, 2000 年, 荷兰;
- 第 8 届, 2001 年, 美国;
- 第 9 届, 2002 年, 意大利;
- 第 10 届, 2003 年, 意大利;
- 第 11 届, 2004 年, 英国;
- 第 12 届, 2005 年, 英国;
- 第 13 届, 2006 年, 瑞典;
- 第 14 届, 2007 年, 巴西;
- 第 15 届, 2008 年, 意大利;
- 第 16 届, 2009 年, 中国。

从上面可以看出, 国际城市形态论坛基本上都在欧美国家举办。那么, 怎么会选在中国召开第 16 次会议呢?

事情要追溯至 2005 年 8 月, 本人受英国伯明翰大学 Jeremy Whitehand 教授的邀请,

赴英国与他及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的谷凯博士（当时还在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工作）一起，开展为期一年的合作研究，课题是由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理事会”（ESRC）资助的“城市形态理论的跨文化应用研究”，宗旨是把 M·R·G·康泽恩的城市形态理论和意大利卡尼吉亚的建筑类型学理论应用到中国的城市形态研究上。

M·R·G·康泽恩是德国籍的城市历史地理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迫到了英国，在那里他经过多年潜心钻研，建立了一整套的城市形态研究理论和方法，开创了今人所知的康泽恩学派。Jeremy Whitehand 教授是康泽恩的学生，是该学派当今最重要的继承人和发扬光大者。卡尼吉亚则是意大利建筑类型学的鼻祖，如今佛罗伦萨大学的 Gian Luigi Maffei 教授是卡尼吉亚学派现在的代表性人物。康泽恩学派和卡尼吉亚学派分别植根于历史地理和建筑学，但在城市形态研究上却有着共同和互补之处，正因为如此，这两个学派在 1994 年发起成立了“国际城市形态论坛”，Jeremy Whitehand 教授则是论坛的核心人物。

2005 年 9 月的一天，在从伯明翰赴伦敦参加第 12 届国际城市形态论坛的火车上，我和谷凯博士有了把论坛带到中国去举办的想法，那样的话，国际城市形态论坛将首次走出欧美，来到亚洲，有助于中国的城市形态研究与国际同行的合作、交流与对话。后来我们和 Jeremy Whitehand 教授商量，他十分高兴，完全赞同我们的想法，表示了极大的支持。此后经过认真准备，我们向国际城市形态理事会正式递交了举办申请，2007 年在第 14 届的巴西论坛上，国际城市形态理事会通过了 2009 年在中国举办第 16 届论坛的决议。从此，长达两年的筹备工作开始了。

教育部批准了论坛在华南理工大学举办。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广州市城市规划协会作为承办方，付出了很大努力。本人承担了组委会主席的职责，谷凯则以副主席兼秘书长的身份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首先根据当前中国的城市发展特征，确定会议主题是“城市形态与城市转型（Urban morphology and urban transformation）”，具体议题包括：

- ①城市形态理论（Urban morphological theory）
- ②城市形态、规划和设计（Urban morphology, planning and design）
- ③城市形态和建筑设计（Urban morphology and architectural design）
- ④建筑类型学研究新进展（New developments in research on building typology）
- ⑤类型学研究、规划和设计（Typological research, planning and design）
- ⑥转型中的城市（Cities in transition）
- ⑦全球时代的城市（Cities in a global era）
- ⑧亚洲城市形态（Urban form in Asia）
- ⑨传统城市形态（Traditional urban form）
- ⑩城市遗产及其变革（Urban heritage and change）

①地球空间技术在城市形态学研究中的应用 (Geospatial technology in urban morphology)

2008年7月组委会面向全世界发出了征文启事,截至当年11月,共收到论文摘要400余份,其中国外的占了绝大部分。经国际城市形态论坛理事会专家成员的审核,共有250余份摘要入选,并于2009年3月公布了名单。到2009年7月论文的全文截止日期,共收到论文200余篇,其中国外的占了3/4。

2009年9月4日至7日,第16届国际城市形态论坛在华南理工大学隆重举行。参会的代表来自26个国家,超过200人,其中150多位来自国外。论坛设一个主会场和6个分会场。4天内,共有7位学者进行了大会报告,分别是:

①中国华南理工大学何镜堂教授的“建筑、雕塑与城市环境的和谐统一”;

②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 Piper Gaubatz 教授的“Reconceptualising the Chinese city: urban form in the context of rapid change”;

③英国伯明翰大学 Jeremy Whitehand 教授的“Making sense of urban landscapes: enhancing research and practice”;

④美国芝加哥大学 Michael Conzen 教授的“The secret life of urban fringe belts: a global comparison”;

⑤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的 Gian Luigi Maffei 教授的“The Canigian school: analysis and design case studies”;

⑥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 Nicola Marzot 教授的“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Canggih School in relation to the Italian typological tradition”;

⑦广州市城市规划局总工程师叶浩军代表局长王东的“广州的城市规划与发展”。

在6个分会场上,中外学者们进行了广泛的交流,气氛热烈。整个会议进展顺利,秩序井然,其间也没有发生任何技术故障。中国近些年的快速发展,华南理工大学美丽的校园,先进的设施,特别是学生志愿者的出色表现,都给与会代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后,许多国外学者分别参加了我们安排的北京、香港、上海、深圳、广州的学术旅行。

考虑到各种因素,这次论坛的英文文章精选后将另行出版。这本论文选仅收集了参会的部分中文文章,由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些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阶段中国城市形态研究的一种实际,留下了一个历史的脚印。

第16届国际城市形态论坛的召开也得到了我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0878086, 50378038)、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8151064101000052)、广东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创新团队项目(07JDTDXM84002)的资助,特此致谢!

田银生

2009年12月28日

目 录

中国体制转型背景下的单位制社区变迁	张 汉(1)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形态演变的基本总结	熊国平 杨东峰(5)
转型与转移背景下的 1949—1978 年城市规划与城市形态演变	黄 立 李百浩 孙应丹(12)
巴黎城市空间形态解析	卞素萍(23)
速度景观中的当代城市形态——一个城市设计的框架	魏羽力(30)
概述当代法国式的“Projet Urbain”的文化	莫浙娟(38)
广州宋代城市空间形态格局初探	孙 翔 田银生(52)
中国传统城市形态的精神功能——以广州为例	周 祥(61)
古代岳阳城市空间形态演变	傅 娟 肖大威 魏 成 许吉航(69)
杭州旧城空间形态演变实证研究	李 建(78)
赣州古城的历史文化保护与城市形态发展	黄 翼(95)
历史文化对云南侨乡城镇形态的织补	撒 莹 王 波(100)
基于传统肌理和形态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以佛山祖庙东华里历史 街区为例	梁励韵 刘 晖 张智敏(106)
村落空间形态与步行运动——以婺源汪口村为例	王浩锋(116)
城乡结合部景观空间演变的文化解读——以珠江三角洲为例	范建红(132)
转型时期的城乡边缘带空间形态演变——以北京市管庄地区为例	许 昊(139)
城市形态学在城市边缘化地区更新中的应用	郭 聪 刘彤彤 詹 远 孙德龙(147)
转型中的痛苦:城市记忆的丧失	韩林飞 陈方杰(156)
城乡土地产权关系视角下的空间形态研究——以佛山顺德为例	黄慧明(171)
天津五大道租界区非重点保护建筑的现状考察与改善对策——中美联合设 计教学交流课题之一	解 丹(188)
广州历代佛教寺庵分布特征研究	何韶颖(198)
广州五山近代高校校园历史遗产特征及保护	赵建华 郑力鹏 屈寒飞(208)
“耀华坊”面面观 ——开平碉楼村落的个案	张以红(216)

基于地铁上盖物业开发的微观尺度下经济价值观对城市形态的影响分析	…	叶浩军	(228)
铁路客运广州站和广州东站地区城市形态特征研究	……	张小星	(240)
珠三角地区外商投资对区域经济影响格局的时空演变	……	任健强	(251)
GIS 支持下基于防灾减灾的城市形态优化研究	……	王成芳 孙一民	(262)
南京都市区空间增长模式研究——基于 GIS 和空间分析方法	……	张振龙 马国强	(270)

中国体制转型背景下的单位制社区变迁

张 汉*

摘 要 体制转型背景下的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城市变迁进程，即“城市转型”。单位制是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基本统治体制，在城市层面表现得最为典型，构成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的基本城市管制体制。在城市层面上依据空间维度进行单位组织的划分，就得到了“单位制社区”，这正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城市的基本功能单元和管理单元。宏观的体制转型导致原有的“单位城市”发生新的剧变，新一轮的城市空间重构高潮开始。单位制社区的土地利用形态发生显著变化，“单位集体消费”逐渐解体，新形态的单位生活圈形成。

关键词 体制转型 城市转型 单位制社区 单位集体消费

体制转型中的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城市变迁进程，“城市化”对于中国来说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战略和新的国家积累方法。城市作为中国体制转型的主要空间依托，表现出了体制转型所造成的多方面的效应。中国体制转型进程中的城市问题可以用“城市转型”这一概念来统领，它是指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地理变迁过程，即城市发展战略、增长机制、治理模式和政策体系的转换，以及相应的城市空间重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的变迁。那些正在经历城市转型的城市可以称作“转型城市”。城市转型是中国体制转型的重要实践机制，并且其方向、速度、内容和深度取决于体制转型。

“单位”是工作单位的简称。单位制一度构成中国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全方位场域，并给我们留下深刻的集体记忆。单位制是一种基本的国家统治体系，在国家积累体制（国家生产）、政治统治和意识形态控制的过程中发挥支柱作用，如果没有单位制，上述三种体系和过程都无法建立和实施。单位同时也是唯一的微观社会组织形态^[1]。单位制在城市层面表现得最为典型，构成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的基本城市治理体制。在城市层面上依据空间维度进行单位组织的划分，就得到了“单位制社区”，这正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城市的基本功能单元和管理单元。

由于体制惯性和改革的路径依赖等原因，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单位制并非瞬间

* 张汉，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和纯粹的解组、弱化，而是经历长期的、复杂的变化过程，甚至包括某些形式的异化和强化，反映了新旧体制的复杂交错。单位制对中国城市的空间结构影响深远，塑造了中国特有的“单位城市”。而在1978年之后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则导致原有的“单位城市”发生剧变、新一轮的城市空间重构高潮开始。我们需要把当代中国城市的体制转型和空间重构作为一体化的过程来加以理解，而不应局限于任何单一学科的狭窄范畴而将两者割裂开来。单位制和单位制社区，正是我们获得这种合理解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1 “单位城市”的空间重构与单位土地利用转换

任何城市规划理念都不具备纯粹的所谓“科学性”，而多多少少反映了某种意识形态。城市规划理论建构与实践的过程，也是一个意识形态建构与实践的过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具有完全功能的单位制社区呈团块状散布在城市各处，圈占大量土地，形成一个个“大院”。各个单位制社区本身具备复合功能，在资源获取上基本在其“系统”内部持续的联系，但是不同“系统”之间的联系却很微弱。单位制所构造的社会结构被刘建军^[2]称为“伞状结构”；而在城市空间结构上的表现，笔者则认为可以用“龟裂城市”来形容：各个单位制社区画地为牢，自给自足，相互之间一般不产生空间上的紧密联系，整个城市被众多单位制社区分割为龟裂状。这种城市规划手法是计划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的重要实践，也或许是能够实现的最佳规划方式。而且在客观上，这种城市规划手法还具有很多优点，比如单位制社区可以将居民的工作、生活、消费、休闲、社交等多类型的活动整合在同一社区范围内，从而使日常交通在很大程度上被单位制社区内部化了，步行和非机动车足以应付绝大多数日常交通需求，这就大大减少了城市范围内的交通压力^[3]。

然而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在国家体制转型和意识形态的重构（当然是在各种复杂的话语体系包装之下完成的，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新话语的提出，对“公有制主导”在比例实现方式上的重新诠释，以及通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这样的变通解释方式使土地重新进入市场流通等）的大背景下，以单位制社区为核心元素的计划经济城市规划理念和手法都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于是一场大规模的城市规划理念和实践手法重构的过程也随之展开。新的积累体制把城市空间作为实现持续积累的核心要素之一，城市空间的资本化和城市空间结构的重构依据新的积累体制逻辑持续推进。竞租理论（bid rent）等土地经济学原理成为中国城市空间重构的重要法则。对计划经济城市规划理念和单位制社区的解构首先需要进行意识形态上的合法化，于是类似圈占和浪费土地、缺少合理功能分区、阻碍城市第三产业发展等为单位制社区做负面定性的市场经济话语接踵而至。传统单位制社区必然会主动或被迫地进行各种结构性和功能性的转换。

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土地市场被废除，国家依据生产计划向各种单位分配土地，所以土地利用并不遵循通常的市场经济原理，土地利用强度较低，单位占用了相对于其生产需求和生活需要来说更大的土地量。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由于国家力量的退出和市场竞争的压力，单位从生产过程中获得生存资源越来越困难。随着中国城市建设热潮的高涨和房地产业的空前繁荣，单位突然发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免费获得的大量土地是非常有价值的资源，单位介入房地产市场的热情被空前地调动起来，手段也是五花八门。单位的这种行为转向正是国家积累体制转型在微观层面的写照。由此，单位土地得以资本化从而进入新的积累体制中，单位也从中获取相应的资本收益。

2 “单位集体消费”的解体与单位生活圈的变迁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成员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呈现明显的同质化状态。基本生活消费品采用限量配给的方法，通过单位制把生活必需品（包括住房）基本平均地分配给每一个人；不实行定量分配的消费品也受到样式和价格等方面的严格限定，消除了形成多样化消费模式的可能性。社会成员在社会地位和权力上的差异并未能在其消费模式中显现出来^[4]。国家政体通过压缩国民消费以最大限度地强化国家工业化主导的积累体制，而国民消费的极度压缩必然意味着其不可能成为转移国家积累剩余和扩大再生产的动力源。

“单位集体消费”不同于卡斯特尔所称的“城市集体消费”：首先，两个概念描述的是处于完全不同的两种国家积累体制中的消费现象，其次，消费的组织者和消费发生的场所、内容都有本质性的区别。两者的共同点是消费的“集体性”，即消费的商品和服务都是由国家提供的，面对的是群体消费者而非个体消费者，并且其最终资金来源是社会财富。单位不但是中国计划经济的基本生产单元，而且由于其广泛承担的单位集体消费功能而成为最重要的消费单元。在一个典型的全能型单位制社区中，单位集体消费随处可见，可以说在非单位制条件下可以通过个体消费方式解决的几乎所有消费内容，都被归并或曾经归并到单位内部的单位集体消费之中：饮食、住房、医疗、教育、娱乐、健身、交际等等。单位集体消费并不具有明确的投入（税收）—产出（集体消费的公共产品）观念和相应的监管体制，也不存在所谓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概念。

单位集体消费实际上是经历了一个相当复杂的资本循环过程，而且充斥着同样复杂的意识形态建构过程。国家依靠单位制把绝大多数社会剩余都纳入国家积累体系之中，并宣布国家体制之外的任何个人和组织的资本经营行为都属于非法行为。但为了维持劳动力再生产，国家又不断地将一部分资本通过单位制返还。抽取和返还社会剩余资本都是以单位制为基本操作框架的，即使返还的剩余资本也严厉限制了其使用方法：仅仅用于消费，并

且主要采取单位集体消费的形式。在意识形态方面，则经常通过“福利”、“补贴”等概念进行模糊的界定，弱化这种单位集体消费的本质，从而既减少了国家抽取剩余资本的过程中来自单位和个人的抗性，又减少了单位集体消费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来自单位和个人的高度监督——因为消费行为往往会引起消费者极大的关注度和监督意愿，而福利则往往被认为是额外所得，带有某种“恩惠”的意味，所以较少引起高度的监督意愿。

在中国国家积累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单位作为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积累体制的基本单元，必然遭受到最大的冲击。最明显的现象就是单位资本流量的急剧减少，因为国家积累体制已经不再主要依靠单位制进行资本积累。国家首先减少的是用于单位集体消费的资本返还，于是单位人发现单位的各种福利、补贴不断缩水。而由于单位制在新的国家积累体制中的重要性急剧下降，国家不再需要继续无条件地维持每个单位的生存，国家希望单位制能够自我消解和转型，于是用于维持单位基本生产和生活的资本返还同样逐渐减少。其结果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位集体消费无法在新体制中继续维持，单位集体消费被个体消费取代。而个体消费必然意味着消费模式的分异，消费的内容、层次以及时间和地点都开始多元化，消费的可选择性大大增加。这种体制变化的表象之一是单位后勤体系的解体。单位首先通过承包、租赁等方式将其拥有的后勤服务体系转让给其他组织和个人（包括本单位成员）经营，这就是单位内部集体消费资源向个体消费转换的过程。同时单位之外的各种商业设施也进入单位制社区或靠近单位制社区经营。谭文勇^[3]把单位后勤体系的消解以及外部商业机构对单位制社区的侵入，理解为后单位时代单位制社区转化为“泛单位圈”的过程，也就是人口和空间实体依然比较完整的单位制社区，逐渐演化成为一种以传统单位为核心，在其外围形成为单位服务的后勤圈的现象。

参考文献

- [1] 李路路. 论“单位”研究 [J]. 社会学研究, 2002 (5): 23-32.
- [2] 刘建军. “跨单位组织”与社会整合——对单位社会的一种解释 [J]. 文史哲, 2004 (2): 146-155.
- [3] 谭文勇. 单位社会——回顾、思考与启示 [D]. 重庆: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2006.
- [4] 许菁芸. 城市社区多元化变迁的认识及规划应对——宝山友谊路街道社区发展研究 [D]. 上海: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2006.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形态演变的基本总结

熊国平* 杨东峰

摘要 本文基本总结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形态演变,指出外延跳跃是城市形态演变的主要形式;以产业空间为中心的新空间主导城市形态的演变。

关键词 20世纪90年代 城市形态 基本总结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新的社会经济背景的作用下,我国城市形态演变的速度快、规模大^[1],新的发展动力不断出现,有着新的演变规律。

1 外延跳跃是城市形态演变的主要形式

内涵增长和外延增长在城市增长的过程中,始终存在并相互补充,城市发展的不同时期表现特征不同。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内涵式增长始终存在,以退二进三最为典型,但我国进入快速城市化时期,外延跳跃成为城市增长的主要形式,其表现在开发区的建设上。

1.1 内涵外延复合,以外延增长为主

从长三角16个城市1990—2004年用地扩展系数来看,用地扩展系数在1.5~2之间的城市8个,占50%;用地扩展系数小于1.12的城市1个,占6.25%;用地扩展系数大于2的城市2个,占12.5%;用地扩展系数大于1.12小于1.5的城市5个,占31.25%;平均用地扩展系数为1.56,表明长三角城市在1990—2004年期间,城市用地以外延增长为主。

我国城市在外延增长的同时,出现了“退二进三”等内涵改造复合快速进行的局面,使我国城市形态演变丰富而多样。

* 熊国平,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建设部软科学研究项目2007-R2-1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0801049

表 1 长三角城市建成区用地扩展指数构成 (1990—2004 年)

	城市数量	所占比例 (%)
$K < 1.12$	1	6.25
$1.12 < K < 1.5$	5	31.25
$1.5 < K < 2$	8	50
$K > 2$	2	12.5
	16	100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1990》、《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04》整理。

1.2 渐进跳跃共存，以跳跃扩展为主

开发新区，跳跃式发展，是保证经济快速发展和人口继续集聚的需要。从 1990—2002 年我国城市形态演变来看，一般而言，10 年期间城市扩展年平均增长 20% 左右的城市跳跃式扩展比较有利，既是城市快速发展的需要，又有支持城市跳跃扩展的实力。跳跃式扩展有两种模式：一种是通过交通干道沿市中心放射状建设新区，用地的结构比较紧凑，向多中心城市或组团城市发展。另一种是建设有生态空间分隔相对配套的新区，用绿色空间分隔，城区之间布置大容量的快速交通干道系统，向组团城市或组合城市发展，深圳、厦门、上海、苏州为跳跃式发展成功的典型实例。如在 10 年间，城市扩展年平均增长 20% 左右的城市不采用跳跃式扩展，则会贻误调整城市空间结构的机遇，影响城市持续快速扩展，北京就是典型实例。城市的渐进式扩展始终存在，从城市边缘不断向外扩展，呈团块状、星状、连绵带状。从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城市形态演变来看，一般而言，10 年期间城市扩展年平均增长不到 20% 的城市以渐进式扩展比较有利，城市形态类型维持旧的格局。在经济发展不快、城市扩展压力不大的情况下，其他因素促使城市跳跃式扩展，改变城市形态类型，这种超前和超经济实力的过度发展会影响城市的发展，反过来会阻碍城市的健康持续发展，难以取得很好的效果，南通、连云港的发展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总体来说，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城市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时期^[2]，城市用地快速持续扩展，大多城市具备了跳跃式扩展的条件，事实上大多城市也是采用跳跃式扩展，建设新区的方式适应我国的快速城市化。

表2 我国部分城市扩展速度与扩展方式一览表

城市名称	扩展方式及效果	建成区面积 (平方公里)		城区面积平均 年增长率(%)
		1990年	2002年	
上海	跳跃发展, 建设浦东, 成功	248	550	18
南京	跳跃发展, 建设浦口, 不理想	129	212	14
苏州	跳跃发展, 建设新区、园区, 成功	37	109	25
无锡	渐进发展, 建设新城, 成功	51	164	27
常州	跳跃发展, 建设沿江, 不理想	38	71	16
镇江	渐进发展, 沿江带状, 成功	28	63	19
南通	跳跃发展, 建设开发区, 不理想	26	73	23
扬州	渐进发展, 建设新区, 成功	25	53	18
泰州	渐进发展, 建设南部新区, 成功	12	40	28
杭州	渐进发展, 建设滨江新区, 成功	68	227	28
宁波	跳跃发展, 建设港区, 不理想	58	74	11
嘉兴	渐进发展, 建设新区, 成功	20	46	19
湖州	渐进发展, 建设新区, 成功	15	55	31
绍兴	渐进发展, 建设新区, 成功	15	35	19
舟山	跳跃发展, 建设滨海新区, 不理想	19	55	24
台州	渐进发展, 建设新区, 成功	20	81	34
北京	渐进发展, 建设新区, 成功	395	780	16
广州	渐进发展, 建设新区, 成功	182	526	24
深圳	跳跃发展, 建设带状组团, 成功	61	147	20
珠海	跳跃发展, 建设西区, 不理想	38	69	15
连云港	跳跃发展, 建设开发区, 不理想	38	52	11
徐州	渐进发展, 建设新区, 成功	62	78	10
海口	渐进发展, 连绵带状, 成功	25	34	11
青岛	跳跃发展, 建设开发区, 不理想	93	123	11
大连	跳跃发展, 建设开发区, 成功	101	234	19
合肥	渐进发展, 建设开发区, 成功	66	125	16
厦门	跳跃发展, 建设环岛组团, 成功	40	87	18
平均		165	230	22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0》、《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2》整理。

城市用地扩展是渐进还是跳跃与城市规模也有一定的关系, 渐进发展是中小城市较为适宜的扩展方式, 大城市规模大, 经济实力越强, 对于城市拓展的适应能力和改造强度大, 城市形态就显现出更强的灵活性, 选择跳跃式发展的几率大。

1.3 开发区是跳跃扩展的主要载体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几乎每个城市都建设了开发区, 有的城市有多个, 开发区面积可以与原城区相当甚至超过, 对原来的城市形态产生强烈的冲击, 成为城市跳跃扩展的主要载体。开发区按与城市的区位关系大致分为边缘跳跃、近郊跳跃、远郊跳跃三种。

2004年, 从我国54个国家级开发区与主城距离来看, 有19个距离主城小于5公里, 占35%; 有21个距离主城5~20公里, 占38%; 有14个距离主城大于20公里, 占27%。与城市的关系来看, 相应发展为新城的开发区有19个, 占35%, 保持为团块状或连绵带状或星状城市形态; 相应发展为城市组团的开发区有23个, 占43%, 形成组团状或组团带状城市形态; 相应发展为独立城区的开发区有9个, 占17%, 形成组合城市形态, 见表3。

一般而言中小城市经济实力有限, 开发区规模不大, 选择在城市边缘跳跃扩展比较有利, 多为团块状; 大中城市经济实力强, 开发规模大, 选择在城市近郊跳跃扩展比较有利, 向组团状或多中心团块状转化; 特大城市、大城市辐射范围广, 经济基础雄厚, 有条件可选择在城市远郊跳跃扩展。受自然条件的限制, 河口、滨海城市开发区多在远郊临港口而建, 山地城市受地形条件约束较大, 开发区也可能选址远郊, 形成港城组合的形态。

表3 我国国家级开发区区位一览表(2004)

名称	离主城距离	与城市关系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距市中心 16.5 公里	城市组团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	距市中心 5 公里	城市组团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	距市中心 8 公里	城市组团
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	距市中心 13.6 公里	城市组团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	距市中心 27 公里	组合城市
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	距市中心 30 公里	组合城市
东山经济技术开发区	孤岛	独立工矿区
福清融侨经济技术开发区	距福清区 5 公里	城市组团

续表

名 称	离主城距离	与城市关系
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距福州市中心 18 公里	城市组团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距广州市中心 22 公里	城市组团
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	陆路距广州 54 公里	独立工矿区
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距市中心 5 公里	新城区
哈尔滨经济技术开发区	距市中心 8 公里	城市组团
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	至海口 100 公里	独立工矿区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距市中心 20 公里	城市组团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	距市中心 8 公里	城市组团
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	距市中心 2 公里	新城区
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	距市中心 4 公里	新城区
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	位于城区东侧	新城区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	距市中心 10 公里	城市组团
兰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城区北侧	新城区
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距市中心 22 公里	组合城市
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	城区北侧	新城区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距市中心 15 公里	城市组团
南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距市中心 4 公里	新城区
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	距市中心 12 公里	城市组团
宁波大树经济开发区	距市中心 40 公里	组合城市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	距市中心约 27 公里	组合城市
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	距市中心 1 公里	新城区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	距市中心陆路 80 公里	组合城市
上海漕河泾经济技术开发区	距市中心 11 公里	新城区
上海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	距市中心 6.5 公里	新城区
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	距市中心 11 公里	新城区